

四川古代名人

張秀熟署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四川古代名人

《历史知识》编辑部

李有明 陈红涛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94047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四·十二·成都

994047

封面题字：张秀熟
责任编辑：张 力
封面设计：肖光舜

四 川 古 代 名 人

《历史知识》编辑部编辑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市书林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75 字数：220千
1984年12月第一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书号：11316·14

定价： 1.20元

前　　言

《历史知识》编辑部对历史人物的介绍是比较重视的。我们计划编写历史上四川地区出现的杰出人物，是两年前的事了。去年，经过与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西南民族学院民族历史研究所、四川省文史馆、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市文化局、巴蜀史研究会等单位有关专家、学者研究，组成《四川古代名人》编写组，拟出编写计划后，分头承担各专题的编写。

我们编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加强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宣传。我们常说：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祖国的历史，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源泉。要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光辉文化、优良传统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并对其产生着深厚的感情，才能有对祖国前途远大的信念；才能有为国家独立、富强和繁荣而献身的积极行动。历史事件，总是由历史人物活动构成的；灿烂的文化也是历史人物所总结、发明、创造的。为此，正确地介绍历史人物，使其在群众思想上能形成高大的形象、爱戴和学习的榜样，或作为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从而加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加深对祖国的热爱。这就是我们在编写此书时，所希望能作出的贡献。

四川地区的发展史，和祖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在四川美丽、富饶的土地上，自古以来，抚养出很多勤劳勇

敢、爱国爱民、大有作为、流芳千古的人物，其中，有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史学家、巾帼英雄和农民起义领袖。他们的生平事迹，不仅为开发繁荣四川作出卓越的成就，有的杰出人物，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贡献。

我们编写此书，也还是一种尝试。四川古代，人才辈出，何止千数！此书所编选的仅是其中很少一部分较有代表性的人物，还远不能包括名人全部和反映蜀中古代人物全貌，有待以后再续。

本书末附有《四川古代历史人物索引·先秦两汉部分》（秦汉以后的，待续编再附），供参考。另还附有《蜀人历任宰相、宰辅简表》，简列出汉至清代蜀人任过宰相、宰辅的五十一人。

参加本书编写和审阅的有：李有明、陈红涛、沈庆生、冯一下、邓卫中、刘忠贵、陈一石、徐春曦、李少海、李思桢、曾文琼、黄剑华、萧宗弟、魏明生、李祖桓、张学君、胡学芳、蒋维明等同志，由李有明、陈红涛同志主编。限于水平，定还存在不少缺点，甚至错误，我们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历史知识》编辑部

1984·6·

目 录

前 言

我国最早的历算学家落下闳	(1)
汉赋的奠基者司马相如	(7)
博物洽闻的扬雄	(14)
三国名将甘宁	(19)
蜀国大将王平	(25)
《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	(29)
流民起义领袖李特	(35)
大成政权的创建人李雄	(42)
隋代制造发明家何稠	(48)
开一代诗风的陈子昂	(51)
杜甫的诗友苏涣	(58)
天文仪器制造家梁令瓌	(65)
一身出能定三军的浣花夫人	(70)
“一瓢诗人”唐求	(75)
前蜀女诗人黄崇嘏	(78)
五代绘画艺术大师黄筌	(81)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前驱苏舜钦	(87)
中年发愤成名的苏洵	(94)
博学多才、爱国恤民的苏轼	(99)
为《新唐书》《新五代史》纠谬的吴缜	(109)
诗人兼书画家文同	(116)

《资治通鉴》的副总编范祖禹	(121)
北宋农民起义领袖王小波与李顺	(128)
南宋爱国名将张浚	(134)
爱国军事家、政治家虞允文	(143)
南宋大史学家李焘	(149)
《资治通鉴》注释家史炤	(154)
敢忤秦桧的“小东坡”赵逵	(158)
“水晶灯笼”孙道夫	(160)
蒲江“三高”——高稼、高定子、高斯得	(163)
魏了翁与“鹤山书院”	(173)
四川“花木兰”韩娥	(176)
“直声动天下”的邹智	(179)
明中叶的政治改革家杨廷和	(185)
一代雄才杨升庵	(193)
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唐甄	(203)
清初名臣张鹏翮	(208)
爱国名将岳钟琪	(214)
李调元与十万卷楼	(222)
清代农业科学家张宗法	(229)
七世达赖喇嘛	(233)
政绩留黔江的诗人唐乐宇	(238)
蜀中诗人张船山	(241)
白莲教起义军首领徐天德	(246)
白莲教义军猛将冉天元	(251)

附录

四川古代历史人物索引(先秦两汉部分)	(257)
蜀人历任宰相、宰辅简表	(290)

我国最早的历算学家落下闳

西汉时期，我国民间有一位杰出的历算学家，那就是落下闳。

落下闳，字长公，西汉巴蜀阆中人（今四川阆中县）。他从小就喜欢观察天象，爱好天文，加上他能虚心求教，刻苦钻研，因而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早期杰出的一位民间历算学家。他为我国古代天文学、历算学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我国古代历法的种类很多，仅《汉书》就记载有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六种。这些历法都是战国时期各国使用的历法，由于各家所取的历元不同，就形成了四季混乱，给生产、生活带来了困难，人民群众早就渴望对历法进行改革。秦统一后，在全国推行颛顼历，基本上结束了战国以来历法的混乱局面。但，颛顼历经过一百一十多年的使用后，累积误差越来越大，出现了“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的严重情况。改革历法已经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了。

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汉武帝派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司马迁从巴蜀回到长安后的第二年，就向汉武帝提出改革历法的建议，并推荐落下闳参与建造新历法。汉武帝批准了司马迁的奏请，决定由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

司马迁和从民间征召来的天文学家落下闳、唐都等人共同议造汉历，由司马迁主持其事。从此开展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历法大改革。经过讨论，最初提出了修改方案十八个，汉武帝对这十八个方案都亲自斟酌，逐一审查，最后罢去十七家之说，采用了落下闳、邓平提出的“八十一分律历”的方案。从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开始，约经七年，到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新历才告完成。新历初用夏正，以正月为岁首，因此汉武帝将新历定名为“太初历”，并改年号为太初。这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部最完整的历法。汉武帝为了表彰落下闳的功绩，特授以侍中之职，但落下闳视“富贵如浮云”，鄙薄功名利禄，公然拜辞回家。他决心要以他有生之年，进一步继续总结研究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天文科学。

根据落下闳、邓平提出的“八十一分律历”的方案而创制的太初历，比过去的任何一个历法都科学，取得了很高的科学成就。

首先是坚持天象实测，考定历代重大的天文数据，使太初历的制定建立在科学实践的基础上。古代编制历法，一般说来就是把两次日月会合的周期定为阴历一月（即朔望月），朔日为一月之始。这是由于日月运行，每月都要产生一次朔望日（初一、十五）的原因。所以，日食在朔，月食在望。不过，朔日一定要日月在同一黄经圈上相遇，望日必须要求日月在同一黄经圈上相对，才能产生日食和月食。但月亮绕地球运行的轨道（白道）与地球绕太阳运行的轨道（黄道）并不在一个平面上，这样二者相叠对时往往要产生五度多的交角。因此，在古代，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对日食、月食测算很不精确，致使一种历法用到一定年代就要产生积累误

差，形成在历法上的月初或月末也会看见月出的混乱现象。落下闳经过大量的天文观测，并参阅了历代积累的天文数据，在中国天文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测算了一百三十五个月的日食周期。这个周期称为“朔望之会”。他测算出大约在十一年中有二十三次日食发生，他以“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之四十三”，就是一月等于 $29\frac{43}{81}$ 日。落下闳就是根据这一科学测定的日食周期，才提出“八十分律历”。在太初历中，落下闳还测定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会合周期（即连续两次同太阳相合的时期），落下闳所测定的数据同现代所测定的数据相比较，误差最大的火星为0.59日，而误差最小的水星，仅仅相差0.03日，即43.2分钟，两千多年以前，对行星能够得出这样精确的测值，实在是世界罕见的奇迹。

其次，太初历开始确立以孟春正月为岁首的历日制度，把历法同四季的顺序、人民群众的习惯和要求统一起来。历代封建统治者，用封建迷信来愚弄人民，往往依其需要而确定一年的岁首。譬如秦朝推行的颛顼历就是以冬季十月作为岁首的政治年度，即每年开始的第一个月为十月，按照这个顺序安排下去，是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端月（因避秦王嬴政之讳，故称端月，到了汉朝才改正月）、二月到九月岁终。遇到闰年的闰月就置于岁末，称为后九月。史实发生的年月，也完全按冬、春、夏、秋的顺序安排。但是，劳动人民为了正确掌握农时，一直仍以正、二、三月为春，四、五、六月为夏，七、八、九月为秋，十、十一、十二月为冬的顺序安排生产和生活。这就和统治阶级颁行的历法相对立，造成许多不方便。落下闳在制定太初历时，就结合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四季的顺序，规定每年以孟春正月朔日为岁首，到冬

季十二月底为岁末。落下闳确立的这种历日制度，两千多年来一直沿用，这是他的伟大功绩。

第三，太初历改革了闰法，以无中气之月，置闰。落下闳把一个回归年的二十四个节气，从冬至开始，依次序按一、三、五、七、九、十一奇数的顺序安排出冬至、大寒、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这叫中气。同时，又按二、四、六、八、十、十二偶数的顺序安排出小寒、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这叫十二个节气。在具体安排时，还要根据启闭的时间来定。所谓启，就是指万物生长；所谓闭，就是秋收冬藏。启就是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个节气，是一年四季的开始；闭就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中气，是秋收冬藏的季节。节气可以排在本月的上半月，也可以排在上月的下半月，但中气必须排在指定的月份内。所以，十二个中气，都要逐一安排在十二个月份内。如遇闰年，有十三个月，那就有一个月安排不上中气，这叫做闰月。这就是落下闳提出的无中气之月置闰法，它使每一节气或中气的日期和其平均日期相差不到半个月。这是历法为劳动生产服务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也是我国古代历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这种置闰法一直沿用到明代末年，使用了一千七百多年。

此外，落下闳在编制太初历时，是经过精密的数据推算的。据近人吕子芳教授研究认为，落下闳在编制太初历时，是用合于近代连分数的原理进行计算的。连分数的理论，在西欧直到公元1579年才由朋柏里提出来。我国落下闳对这一原理的提出和运用，比西欧早了一千六百多年。落下闳在数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不能忽视的。

落下闳在制定太初历时，本着“历之本性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的认识，亲自制造了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精密的观测仪器，这就是中外闻名的落下闳浑仪。我们根据《史记》和《旧唐书》等记载推想，落下闳创造的浑仪，外表象个浑圆的天球，周长二丈五尺左右，直径有八尺。圆球由赤道环和其他几个圆环重叠组成，环上刻有周天度数和二十八宿的距离。圆环有的固定，有的可以绕天轴自由转动，中间装有窥管，直径一寸。观测时只要转动圆环，以窥管瞄准某个天体，从圆环上的刻度就可以推定日月五星的运行及方向。落下闳创制的浑仪，是我国古代天文学领域的一项杰出成就。

落下闳通过他创制的浑仪对天体进行具体观测，从而为我国古代长期发展起来的重要宇宙观——“浑天说”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我国在战国以前，有所谓盖天说，那时一般认为“天圆如盖，地方如棋局”，天象一个圆盖盖在方形的地球上，这就是所谓的“天圆地方”说。到战国时期，惠施（前370～前310年）提出了天地都是圆形的设想，开始突破天圆地方说。但使浑天说发展成一种比较完整的宇宙结构学说，是由落下闳完成的。落下闳的继承者张衡（78～139年）对落下闳的浑天说作了较完整的表述：“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小。天表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天转如车轂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也。”这种从原始的盖天说到比较先进的浑天说，由平面方形的大地到球形的大地，这是宇宙理论中，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一次飞跃，是人类认识宇宙历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当然，落下闳完成的浑天说与宇宙的实际并不完全一样，今天我们早

已认识到宇宙的无限性了，无边无际的天空根本不是一个有形的天球，地球也不是位于宇宙的中心。但是，我们从观测天文学的角度来说，仍然要一个假想的天球，把地球位置固定在天球中心，才能用坐标表现出天体的方位及其运动。在天文学的术语上，这叫做“球面天文学”。可见，浑天说和球面天文学家的出发点是一致的。落下闳所完成的浑天说成为我国古代宇宙结构的先进学说，一直占居主导地位。

落下闳在我国古代天文学上之所以能取得这样重大的成就，其最根本之点，就在于他重视实践，勇于革新，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来指导自己的科学活动。这种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落下闳为我们留下的不仅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且还有丰富的精神财富。

汉赋的奠基者司马相如

“武帝时代，赋莫如司马相如，文莫如司马迁”。司马相如的辞赋，“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年），字长卿，少名犬子，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他说话有些口吃，但从小喜欢读书，也学过击剑。少年时代，读战国历史，深为蔺相如的为人品质所感动，于是更名为“相如”。这时，他家相当富裕，因为家财得以拜为郎，当上了汉景帝的武骑常侍，任务是陪皇帝打猎。他曾受业于著名经学家胡安，又善于写文章，希望在文学领域里有所作为，不喜欢武骑常侍这样的差事。有一次，喜欢招延宾客游士的梁孝王刘武到长安朝见皇帝，司马相如和他见了一面，谈得很高兴。不久，司马相如便以身体不好为理由，辞去职务，东游梁国（西汉封国，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作了梁孝王的宾客。当时的梁，可以说是全国文学活动的一大中心，著名辞赋家邹阳、枚乘、严忌子（庄夫子）等都在这里。司马相如在梁地住了几年，经常和文人们交往，写下不少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子虚赋》。司马相如写作很用功，据说他写《子虚赋》等作品时，断绝交游，杜门不出，把整个身心都沉浸到创作中去了。“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而睡，焕然而兴，几百日

而后成”（《西京杂记》）。

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回到故乡成都。这时他家已经衰败，贫穷无以为生。他有个朋友叫王吉，时为临邛（今四川邛崃）令，邀他前去暂住。司马相如来到临邛，王吉觉得没有好的办法帮助他，便决定用自己的县令身份去抬高他的地位。王吉对他十分恭敬，每天都到住地看望。临邛富豪之家很多，误以为司马相如是什么显贵，便另眼相看，还设宴招待。这天，临邛第一富家卓王孙设宴，王吉早早就去了，左等右等却不见司马相如来。中午了，主人又派人去请，司马相如称病不来。王吉又亲自去请，好不容易才请来。当司马相如进入宴会大厅时，所有在座的人都为他的风采所倾倒。酒酣，王吉请司马相如表演弹琴，宾主们一股劲的欢迎。司马相如见推辞不掉，便调拨琴弦，弹唱出美妙悠雅的曲子：

“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兮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凤兮凤兮从凰栖，得托子尾永为妃。交情通体必和谐，中夜相从别有谁。”司马相如当时所唱是否就是这样的词句，现在已难以考证。但那动人的曲调的确打动了一个人的心，这个人就是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原来，卓文君丈夫死去不久，寡居家中。她从别人口中知道才学过人、风度翩翩的司马相如来到临邛，可惜无法见面。今天，她悄悄地躲在一旁听司马相如弹琴，听到这样好的曲调和歌声，爱慕之情便油然而生。而司马相如呢，也早从王吉那里知道了卓文君，只是没有机会接触。这次宴会以后，他通过卓文君的侍者，向文君表白了爱慕之情。一天夜里，勇敢的卓文君不顾封建礼教的束缚，从家里逃出，奔到司马相如的住处，结伴到成都去了。

他们在成都的家，除了四面壁头以外，几乎什么都没

有。卓王孙反对女儿不顾礼教，私奔相如，宣布不给女儿一分钱，想用贫穷和饥饿来扼杀这一对年青人的爱情。卓文君并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不久，她和司马相如又回到临邛，卖了车马，买下一家小酒店，作起卖酒的小生意来。卓文君当垆卖酒，司马相如身着犊鼻裈（即围裙），打杂洗酒器，忙个不停。卓王孙认为女儿竟干如此低下的行当，有伤他这个大财主家的风雅，便杜门不出。亲友中不少人同情卓文君的遭遇，欣赏司马相如的才华，纷纷劝卓王孙不必如此过分，并希望他和女儿、女婿和好。卓王孙见无法使女儿屈服，只好给女儿补送一份嫁妆，分给童仆一百人，钱一百万。于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又回到成都，购置田地房屋，过着富裕的生活。

汉景帝死后，汉武帝即位。有一天，汉武帝读了侍者杨德意送上的《子虚赋》，连连称赞。汉武帝还以为是前代哪位辞赋家的作品，惋惜地说：“我怎么不能够与这赋的作者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呢？”杨德意说，这是他的同乡司马相如的作品。汉武帝大吃一惊，立即召见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见到皇帝以后，报告了写作《子虚赋》的经过，并说这是写诸侯的事情，还不够壮观，表示愿意再写一篇《天子游猎赋》，献给皇帝。汉武帝高兴地同意了，命尚书发给笔札。司马相如倾注全力写成《天子游猎赋》，上奏天子。汉武帝极为赞赏，即以司马相如为郎。

公元前130年（元光五年），汉朝在设置了夜郎郡（位于今贵州北部、四川南部）以后，又派唐蒙去打通西南夷道（即石门道，从今四川宜宾、经云南昭通、贵州威宁、复至云南宣威、曲靖、昆明）。为了完成这艰巨的工程，成千上万的巴蜀人民被迫离乡背井，去从事艰辛的劳动，死者甚

众，在巴蜀引起很大惊恐。公元前128年（元朔元年），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出使巴蜀去抚慰民众。他到了西南以后，一方面责备唐蒙处置不当，另一方面又写了《谕巴蜀檄》，通过巴蜀太守向人民说明，唐蒙不当之处非皇上的本意，已责令改进，同时又希望巴蜀人民“急国家之难”，“尽人臣之道”，理解和支持开发西南夷道的工作。回到长安以后，司马相如及时向汉武帝作了奏报。他本人是支持开发西南夷道的，所以在指出唐蒙作法上的一些错误以后，又介绍了一个新的情况，那就是居住在邛（今四川西昌）、笮（今四川雅安）一带的“西夷”，听说夜郎等地的“南夷”与汉朝通往，得到很多赏赐，也愿意归附汉朝，享受和“南夷”一样的待遇。汉武帝征求司马相如的意见。司马相如说：“西夷中的邛、笮、冉駹等部，靠近蜀地，交通极为方便。秦朝曾在这里设过机构管辖，汉初才废止了。如果要设置郡县，恢复管辖，不是什么难事，比管理南夷还要方便一些。”于是汉武帝以司马相如为中郎将，负责开发西南夷。

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司马相如来到成都，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同行。蜀郡太守率领官员到郊外迎接。蜀郡百姓都为家乡出了这样的人才而感到自豪。临邛的富家们也赶来馈赠礼物，敬献殷勤。卓王孙后悔女儿嫁给司马相如太晚了，又分了一笔数量可观的财产给卓文君。司马相如接受了西夷邛、笮、冉駹等部的归附，拆除了旧的边关，在西面的沫水（今大渡河）、若水（今雅砻江）和南面的牂牁（今贵州中部）设置新的边关，打通了灵关道（在今四川峨边以南），在孙水（今安宁河）上架起桥梁，开辟出通往邛部（今四川西昌）的道路。为了说服那些不赞成开发西南夷的蜀地父老，司马相如写了著名的《难蜀父老》，说明